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特别策划

66 娜嬛娜珍

抗瘟疫造就一代医圣

——张仲景与他的《伤寒杂病论》

郑千山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举国上下,诚如鲁迅先生吟咏的那样“斗士诚坚共抗流”,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勇画面。在这场抗疫斗争中,祖国传统医学(中医)依据辨证论治原则与方剂学等,积极加入到抵抗疫魔的战斗中并立下功勋,这让我们不得不怀念和敬仰在1800多年前抗疫斗争中成长起来且立下不世功勋的一代医圣张仲景。



张仲景,名机,字仲景,东汉南阳郡涅阳县(今河南邓州市,另说河南南阳市)人。相传曾举孝廉,做过长沙太守。他自小笃实好学,博览群书,善于思考;他从史书上看到扁鹊望诊察桓公的故事,对扁鹊的高超医术非常钦佩,“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蔡桓公又称齐桓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从此对医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年轻时曾跟同郡名医张伯祖学医,经过多年刻苦钻研和临床实践,遂医名大振。

张仲景生活在东汉末年,那正是一个朝政腐败、天下大乱、战争频仍的时代,豪强争霸,饥馑和瘟疫的大流行,造成全国“生灵涂炭,横尸遍野”,百姓流离失所,病痛蔓延,惨不忍睹。作为一个医者,张仲景忙于四处奔走,救死扶伤,亲眼目睹了各种瘟疫与流行病给百姓造成的严重后果。

据史书记载,东汉桓帝时大疫三次,灵帝时大疫五次,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成千上万人被病魔吞噬,以致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其中尤以东汉灵帝(公元168—188年)时的

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等几次的疾病流行规模最大。南阳地区当时也接连发生瘟疫大流行,许多人因此丧生。张仲景的家族本来是个大族,人口多达200余人,自从建安初年以来,不到10年,有三分之二的人因染疫病而死亡,其中死于伤寒者竟占了十分之七。这种场景让张仲景感到十分痛苦,他暗下决心,潜心研究伤寒病的诊治,一定要制服伤寒症这个瘟神。

张仲景刻苦研读《素问》《灵枢》《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产方》等古代医书,继承《黄帝内经》等古典医籍的基本理论,“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广泛借鉴其他医家的治疗方法,细心诊病治病,在实践中总结经验。针对伤寒,他逐步确立了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辨证论治原则,经过筛选和归纳,他总结出中医的经方,创造了很多剂型。诊病之余,他开始撰写医书,建安十五年,他写成了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临床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十六卷(经后人整理成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本书)。《伤寒杂病论》集秦汉以来医药理论之大成,系统概括了“辨证施治”的理论,由于来源于实践,也是我国第一部临床医学巨著,奠定了中医病因学说和方剂学说的基础,后来该书被奉为中医“方书之祖”,张仲景也被誉为中医“经方大师”。

应该说,正是在大量的诊治疫病的过程中,让张仲景从一位小有名气的医生成长为了后世敬仰的一代医圣。张仲景把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症状,根据病邪入侵经络、脏腑的深浅程度、患者体质的强弱、正气的盛衰以及病势的进退缓急和有无宿疾(其他旧病)等情况,加以综合分析,寻找发病的规律,最终确定不同情况下的治疗原则。他创造性地把外感热性病所有症状,归纳为六个证候群(即六个层次)和八个辨证纲领,以六经(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来分析归纳疾病在发展过程中的演变和转归,以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来辨别疾病的属性,病位、邪正消长和病态表现。由于确立了对病证、症状及治疗的法度和原则,辨证论治成为了指导后世医家临床实践的基本准则。

《伤寒杂病论》周详而实用,并且灵活而妙用无穷。如发热、恶寒、头项强痛,脉浮的表证,张仲景归纳为太阳病,而太阳病,又具有汗无汗、脉缓脉急之别:其中有汗、脉浮缓者属桂枝汤证;无汗、脉浮紧者属麻黄汤证;无汗、脉紧而增烦躁者又属大青龙汤证……在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前提下,既可“舍脉从证”,也可“舍证从脉”,依据病情实际,认真分析,能够摒除假象或次要矛盾,在临床上乱麻一般的复杂病情面前,抓住证情本质,医者就可以执简驭繁,治病时游刃有余,能操胜券。

对于治则和方药,《伤寒杂病论》的贡献也十分突出。书中提出的治疗原则,以整体观念为指导,调整阴阳,扶正驱邪,治法还汗、吐、下、和、温、清、

消、补诸法,对应的还创制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方剂。据统计,《伤寒论》载方113个,《金匮要略》载方262个,除去重复者,两书实收方剂269个。这些方剂均有严密而精妙的配伍,例如桂枝与芍药配伍,若用量相同,即为桂枝汤;若桂枝加倍,则可治奔豚气上冲,若芍药加倍,即成治疗腹中急痛的小建中汤……该书对于后世方剂学的发展,如药物配伍及加减变化原则等都有着深远影响,其中许多著名方剂在现代人民卫生保健中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例如治疗乙型肝炎的白虎汤,治疗肺炎的麻杏石甘汤,治疗胆道蛔虫的乌梅丸,治疗痢疾的白头翁汤,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栝楼薤白白酒汤等,都是临床中常用的良方。另在剂型上的创新,也大大超过了汉代以前各种方书,计有汤剂、丸剂、散剂、膏剂、酒剂、洗剂、熏剂、滴耳剂、吹鼻剂、灌肠剂、栓剂等等。《伤寒杂病论》对针刺、灸烙、温熨、药摩、耳针以及急救等治疗方法也有许多阐述。

张仲景除《伤寒杂病论》外,还著有《辨伤寒》十卷,《评病药方》一卷,《疗妇人方》二卷,《五藏论》一卷,《口齿论》一卷,可惜都早已散佚不存,但一部《伤寒杂病论》足以奠定他在中医史上的重要地位。随着时间推移,这部专著的科学价值越来越显示出来,清代医家张志聪说过:“不明四书者不可以为儒,不明本论(《伤寒论》)者不可以为医”,足见其在医家心中的分量。”后该书流传海外,日本、朝鲜、越南、印尼、新加坡、蒙古等国医学发展都不同程度受到其影响及推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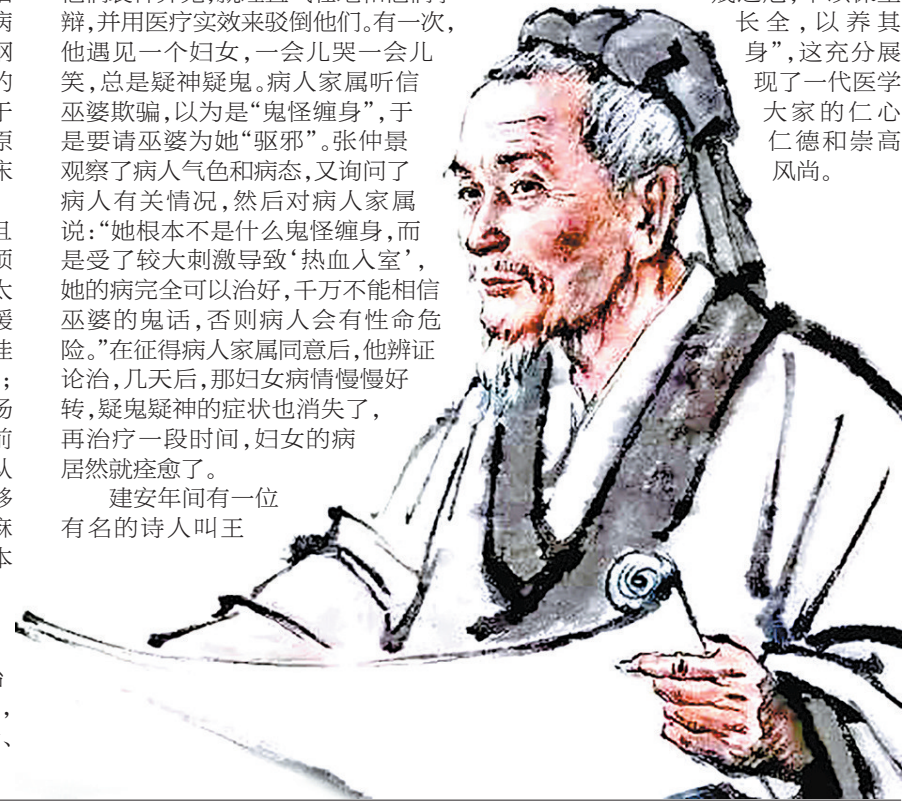
张仲景运用《伤寒杂病论》中的辨证施治,不拘一格,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在医学史上留下了不少佳话——古代社会,巫术盛行,不少贫苦人家有人得病就请巫婆和妖道降妖捉怪,用符水治病,结果往往落得人财两空。张仲景对这些巫医非常痛恨,每次遇到他们装神弄鬼,就理直气壮地和他们争辩,并用医疗实效来驳倒他们。有一次,他遇见一个妇女,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总是疑神疑鬼。病人家属听信巫婆欺骗,以为是“鬼怪缠身”,于是要请巫婆为她“驱邪”。张仲景观察了病人气色和病态,又询问了病人有关情况,然后对病人家属说:“她根本不是什么鬼怪缠身,而是受了较大刺激导致‘热血入室’,她的病完全可以治好,千万不能相信巫婆的鬼话,否则病人会有生命危险。”在征得病人家属同意后,他辨证论治,几天后,那妇女病情慢慢好转,疑鬼疑神的症状也消失了,再治疗一段时间,妇女的病居然就痊愈了。

建安年间有一位有名的诗人叫王

仲宣,与张仲景有较深的交往。一次,张仲景敏锐地辨出他身上潜伏着一种名叫“病疾”(麻风病)的病原,张仲景对他说:“你身上有一种病,得早点医治,要不然到40岁时会脱眉毛,脱眉至半年,将会有生命危险。你先服几剂五石汤吧。”当时王仲宣才20多岁,患有“病疾”被认为是很丢脸的事,所以便没听张仲景的话。不久二人再次相见,张仲景问王仲宣:“你服过五石汤了吗?”王仲宣有些反感地说:“服过了。”张仲景仔细观察了他的气色说:“不像,看你的气色,肯定没有服过。我劝你还是赶快服用些吧,不然就麻烦啦!”可王仲宣还是不信,未按张仲景说的做。果然,20年后王仲宣开始脱眉,脱眉到第187天,便不治身亡。可惜这位极有才华的文学家,就这样只享得中寿。

张仲景从长沙太守任上“致仕”(退休)还乡时,正赶上那年冬天异常寒冷。大雪纷飞,张仲景走在路上,看到许多无家可归的人,面黄肌瘦,衣不遮体,因为天气寒冷,很多人的耳朵都已经冻烂了,他心里十分难受。经过几天的思考,他想出了一个可以御寒的食疗方子,取名“伤寒娇耳汤”。经过实验,他便叫徒弟在屋外搭个棚子,支上大锅煮“伤寒娇耳汤”送给百姓。开始送药汤的那天,正是冬至时节,“伤寒娇耳汤”从此声名远扬。后来经人研究,这“伤寒娇耳汤”其实就是把羊肉和一些寒凉药物放在锅里煮,煮熟后捞出切碎,用麦面皮包成耳朵的样子(娇耳)再下锅,用原汤再将包好馅料的面皮煮熟。人们吃了“娇耳”,喝了汤,浑身发暖,两耳生热,再也没听说有人把耳朵冻伤了。后来“冬至吃饺子”的习俗,据说就是为了纪念张仲景功德而设的。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有这样一段话,说治病的目的在于“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身”,这充分展现了一代医学大家的仁心仁德和崇高风尚。



新书快递

医者仁心报家国
——《钟南山:生命的卫士》推荐

刘昌宇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一个多月中,钟南山院士一直是大家关注的人物。目前,一本关于钟南山的传记新书《钟南山:生命的卫士》(接力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20年2月版)适时推出,以平实的语言,生动讲述了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在医学领域敢为人先的优秀事迹,有力诠释了他“院士的专业、战士的勇猛、国士的担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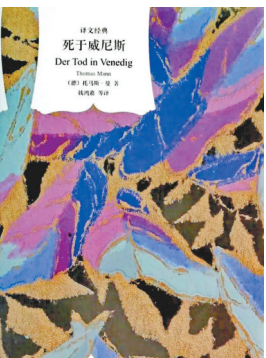
全书重在情感激励。从钟南山学生时代立下宏图大志,以父亲为榜样从医救人;到海外学成归来,用精湛的医术驱病御魔,造福于人民。一个医者仁心、不畏艰险、敢挑重担的勇士形象,鲜明呈现在世人面前。本书深入传主内心世界,力求从他丰富多彩的情感律动中,去塑造一个既平凡而又不平凡的钟南山。让人敬佩的是,钟南山对祖国对人民始终满怀一腔真情。上世纪70年代,他获得去英国爱丁堡医学院留学的机会,当两年留学期满,爱丁堡医学院许以高薪,希望他留在英国时,钟南山却不为所动。他深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是祖国送我来的,我得回到中国。”简朴的话语,却字字带情,连他的英国导师弗兰里也不禁为之动容。

钟南山对自己所从事的医学事业充满了无限的热爱。多年来,在呼吸系统相关疾病的研究中,钟南山以广州呼吸研究所为“根据地”,团结带领科学团队,一边诊疗,一边从事学术研究,没有实验仪

阅读笔记

一部以瘟疫
为背景的世界名著
——托马斯·曼《死于威尼斯》评介

陈子弘



新冠肺炎疫情让大家实际上都已经过起了一个月左右在家隔离的生活,读小说就成在这相对漫长的隔离时光里一个消解焦虑和恐慌的一种选择。在当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蔓延的语境下,大家谈论得比较多的是中国作家的《霍乱之乱》与《花镜病毒》,以及外国作家的《鼠疫》《十日谈》以及《霍乱时期的爱情》。不过我却重新拿起了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著名作家托马斯·曼1912年发表的以瘟疫笼罩威尼斯为背景的中篇小说《死于威尼斯》,把同名电影也看了一遍。这部小说被认为是托马斯·曼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也是欧洲文学中最优秀的中篇小说。

《死于威尼斯》的故事发生在瘟疫肆虐的威尼斯——一位因长年刻苦严谨写作生涯而感到倦怠的德国作家古斯塔夫·冯·奥森巴赫前往威尼斯度假。威尼斯美景唤醒了其感性的内心,他邂逅并恋上了一个波兰少女达秋,他被激情所左右,几乎忘我。因为某种机缘作家滞留威尼斯,而此时威尼斯开始流行霍乱,政府则封锁了消息。作家迷恋少年,长时间地追逐使他精力尽失,同时由于吃了过于成熟的草莓,染上霍乱,最后死于当地荒凉的海滩上。在整个爱恋、追逐直至死亡的过程中,达秋并不知道他的感情,仅仅与他无意中対视过一下,并无交集。小说最后写少年站在海边,做了个朝天的“美丽而苍凉的手势”,仿佛是死亡的另一延续……

卢基诺·维斯康蒂1971年拍摄的同名电影《死于威尼斯》也非常流行,其电影叙述与小说构成了互文关系。有评论家指责维斯康蒂歪曲了托马斯·曼笔下的人物、情节和背景,从而改变了他的故事的本质,比如评论家B·M·凯恩就认为维斯康蒂的电影向观众提供了一个令人陶醉的视觉和听觉盛宴,但对小说原作的深度和微妙之处却是歪曲的。影片虽然对细节的关注,其精美的图像以及“完美的精确度”构成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视觉效果,

器,他们就自己动手制造,没有现成的经验,他们就身体力行从实践中一点一滴积累。在钟南山的带动下,简易支气管激发实验仪、电脑化膈肌动能测定仪、峰速仪等一台台实验设备,都在他们的巧手下诞生了。肺心病、慢阻肺等呼吸病的研究,也相继取得进展,使得广州呼吸研究所的科研水平一举跻身国内先进之列,他们的实验室也成为国内唯一的呼吸系统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1996年,由于钟南山的出色表现,他被授予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工程学部院士,从此,他从事呼吸病学研究的劲头更足了。

科学是没有止境的,只有敢于攀登的人,才能登上顶峰,收获到累累硕果。钟南山就是这样一位不畏前行的人。2002年底,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侵袭了广东。66岁的钟南山冲锋在前,“把所有危重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的大无畏精神,与冠状病毒展开了殊死搏斗。通过大量的临床诊治,他推翻了“非典是衣原体感染”的妄断,并总结出“加大临床医学信息交流、中西药结合治疗、以及将危重‘非典’病人集中到专科医院救治,以减少交叉感染”的宝贵经验,这也成为我国抗击“非典”的诊治指南。由于他在抗击“非典”中的突出贡献,2003年,他先后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CCTV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等一系列荣誉。与此同时,作为人大和政协代表,他更是大胆发声,在两会期间提出的有关雾霾治理、医改要加上医德教育等提案,均引起了国家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并付诸实施,为确保人民的身心健康,奠定了牢固的基石。

对于祖国的公共卫生事业,作为医者的钟南山,同样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2019年12月8日,武汉出现首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此后,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相似的病例频频出现。2020年1月18日,年已84岁的钟南山应邀到武汉,通过调研,他指出此次疫情,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所致,可以人传人。但他又理性地劝导大众,基于目前防控强度和隔离制度,公众对此要有足够的信心。特别是他所言:“武汉本来就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有全国、有大家的支持,武汉肯定能过关。”的动情表白,更是给全国人民的抗疫战斗以极大的鼓舞。

当前,在强有力的防控措施下,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已得到有效遏制。《钟南山:生命的卫士》的出版,无疑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时代标杆,特别对广大青少年来说,钟南山身上所洋溢出的爱国精神和无私奉献情怀,尤其值得学习与铭记。

但它们并没有传达出小说要表达的心理或神话层面的东西。凯恩批评维斯康蒂的主要缺点是他对威尼斯的刻画,因他未能捕捉到小说展现的瘟疫背景下阴险的气氛、怀旧的过往以及布尔乔亚世界,相反,维斯康蒂弄出来的是一个“漫长的感情奇想式的情绪,这是一个闷热和邪恶的唯美主义笼罩着的曼的威尼斯图景”。

关于《死于威尼斯》这部小说,100年来,众多的研究者从历史、文化、哲学到心理学和文学风格等诸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些都同托马斯·曼的小说文本紧密相连。他们将《死于威尼斯》托马斯·曼的一些短篇小说和其他作家的作品进行了比较,考证了托马斯·曼的一次威尼斯之旅,以及他的一些信件和工作笔记。他们还探讨了小说中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学因素,以及对文学和其他方面的影响;探讨了小说对时代背景的处理,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腓特烈大帝的事迹,以及普鲁士主义、新教和现代主义,通过它们出现现代德国、法国以及古希腊的文学影响。

研究者们以托马斯·曼描述的事件为基础,研究了酒神与酒神精神、知识与托马斯·曼的“重生的天真”观念、唯美主义与颓废、狂妄与同性恋、性梦和对文明的不满,并赋予它们更深刻的含义。在对托马斯·曼的叙事手法上重点研究了他对动词和名词的选择,他对各种元素的重复,他的象征和形象,以及他经常讽刺的观点。理解这些叙事特征对理解托马斯·曼的故事至关重要,并且有助于读者了解其高超写作技艺,以及为什么这些技艺符合语言和文学艺术作品的要求。

著名的《死于威尼斯》研究专家埃利斯·舒克曼2003年出版的《托马斯·曼的〈死于威尼斯〉——小说及其批评》一书将该小说在评论以及大众接受上划分为五个时间段,指出每一个时期都有其独特的轮廓。1913—1914年的最初反应是几场文学争论和对奥森巴赫及其作者托马斯·曼本人的攻击,这些评论使该小说成为了争议的对象。这部中篇小说不仅在商业上获得了成功,而且在批评上也获得了成功。从1915年到1955年,它越来越多地被大众接受,这已经反映在许多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解释中了,但学者们却对它的象征意义更感兴趣。从1956年到1975年托马斯·曼去世后的20年里,学界对《死于威尼斯》的回顾,部分是由于查阅了托马斯·曼的原始档案和书信,当然维斯康蒂的电影和布里顿的歌剧也再次炒热了这部小说。1976年至1995年学界重新关注《死于威尼斯》,原因在于《托马斯·曼日记》的出版。在1996年至2001年期间观察到的《死于威尼斯》研究趋势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应用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概念的文化敏感研究的兴起。

《死于威尼斯》可以说是托马斯·曼对理性与欲望思考的结果。这部以瘟疫为背景的小说告诉我们:当一个艺术家在面对美的事物时,如果无法抵御本能欲望的诱惑,必将走向覆灭。托马斯·曼在1950年7月11日的日记中谈到《死于威尼斯》时说:“事实上,三天后再也看不到那个男孩了,我会忘记他的容貌。但这不是我的内心体验,而他却会并入那个文学史不会提及的画廊。”

读书随笔

歌诗合为事而作

——简评云南抗疫诗歌

张永权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是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在国家有难有大事时,诗人们总不会缺席。这次在阻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役中,云南各大媒体,如云南网、云南日报客户端和全省报刊,都发表了大量的抗疫诗歌作品;丽江市文联《壹读》杂志以及楚雄彝族自治州文联《金沙江文艺》等楚雄市文联等组织征集了大量抗疫诗歌作品;《云南日报》推出抗疫诗歌专版,发表了诗人海男等20多名诗人的诗歌;《昭通日报》举办了“抗击新冠肺炎征文活动”,发表了全国各地诗人200多首抗疫诗;《春城晚报·开屏》发表了94岁老诗人张文勋和大批旧体诗词诗人郑千山、张士龙等人的几十首诗词。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各民族诗人与时代同行,和人民共命运,在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中,挺身而出,以诗凝聚力量,给人鼓舞的“为时”“为事”而创作的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精神。

这次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作品,诗歌不仅数量多,优秀作品也不少。著名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的组诗《非常时刻》从小处落笔,大处升华,小诗抒写大情怀;其中的《小小的心》写道:“微信里/有几个武汉朋友/每天早晨/我都情不自禁/——找到他们点个赞/让那颗小小的心/越过千山万水”,诗中常

见的微信点赞细节,用在这里,代表诗人的那颗小小的心,把越过千山万水的牵挂、祝福和家国情怀,跃然纸上,让人品味,爱之深,情之浓,可谓小诗写出了大情怀。白族诗人和四水在《今年的节》中这样写道:“在祝福的春节/解放军出征了/医疗队出征了/新中国出征了/在送10亿红包的春晚中/我不抢一分钱/我的心也出征了”。青年诗人王单飞的《花鹿坪防疫记》,用诗纪实一个叫花鹿坪村庄的抗疫图景,让人身临其境,“村委会的高音喇叭/滚动广播着防疫通知/声音震天,抖落了/几块斑驳的锈迹/像一个站在高处的哨兵”,表现了抗疫斗争已经深入到边远的乡村,诗人接着写道:“疫情就是我们共同的命运……/走在我们前面的/有钟南山、李月娟/……/许多人背井离乡/许多人家离妻别子/一夜之间我似乎又看到了/中华大地上/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悲壮”,诗一下子就提升了思想境界。夏文成的《决战疫情》从一个村民小李老汉个人不摆摊、取消女儿的婚礼入笔到整个公共场所抗疫的大小景象,由点到面,由小到大,由实到虚,最后上升到“各路教授大军在第一时间纷纷向武汉挺进/……/武汉,你不是孤岛……/你们有理由相信/来势汹汹的所谓新冠肺炎必将彻底消灭”,呈现出全民抗疫的时代画卷。李骞的《致武汉》,

以开阔的视野和文化思考中升华出“你是一座文化之城”“你是英雄城市”“你是现代化的城市”的架构,诗意盎然地抒写了诗人对这座城市的真诚礼赞和在疫情肆虐时,情同手足的中华民族,在牵挂中溢出的深情。陈永明的《爱的召唤》,诗意再现了河南扶沟县医院护士刘海燕,在疫病治疗隔离室工作,与来看望他的九岁女儿近在咫尺,却不能走到面前,各自隔空拥抱的姿势,成为抗疫中“一座伟岸的雕像”。吕翼在诗中反思人类的一张嘴,“尝遍人间所有的美味……天空中的仙鹤、山鹰、麻雀/雪山上的豹子、野狼、狗熊……/他们都被我们一一烹任,活剥生吞……甚至有一天/我的舌头会将自己卷走/不留一滴血,一块骨头”,连自己也被吃掉,让人警醒:保护野生动物,也是保护人类自己!此外,刘仁普的《谁是最可爱的人》、阿兹乌火的《致敬钟南山》、陈泽的《钟南山的眼泪》以及梅子的《战地家书》、李胜利的《我是护士,我骄傲》等等,都是充满真情实感的佳作。

这批抗疫诗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基本上都是按诗就是诗的艺术规律创作的。既按文体要求写作,又能在表现手法上尽量多样化。青年诗人吴兴葵的《庚子年初的铭刻》构思出新出奇,诗人以庚子年初的“风”为构思中心,这风带来的信笺,随许多归家过春节的人,走